

清代绿营兵丁的通盗为盗行为及管治

王文箫

摘要 | 清代地方社会频频发生驻守兵丁通盗纵盗、甚至亲身为盗之案。根据档案案件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兵皆土著”的军事制度、微薄的经制俸饷及兵丁本身特殊的军事身份三点。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曾以不断增修律例,扩大刑罚的适用范围和处罚力度的手段尝试整顿,但无法彻底根除此现象。嘉道之后,这一现象更是愈演愈烈。晚清绿营兵丁通盗案的行为已成为地方痼疾,加重了清廷上下对绿营的不信任,表明旧有的绿营军制已不能适应清代社会治理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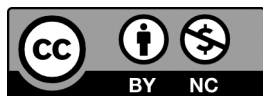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绿营兵丁; 地方治安; 强盗案件

作者简介 | 王文箫,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 明清史、法律史。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清代各省绿营以标、协、营、汛的组织体系星罗棋布地分散驻扎于各地,除承担镇守屯戍、弹压驻防的军事职能之外,还有承差拘捕、缉拿匪徒、察奸解送等任务。全国各处水陆要冲、关隘哨卡的绿营如同人体之神经系统,从而对基层社会进行严密控制。

绿营兵丁与地方捕役本有缉捕盗贼、安靖地方的职责,但却时常发生通盗、纵盗甚至亲身为盗的不法行为。而兵丁本身隶属军事系统,册籍有名,

专管有官,关领朝廷经制内的俸饷,承担朝廷赋予的差操之责,但却仍然与地方贼盗关系暧昧。清代尤其是清中叶之后,“兵役名为捕贼,潜且豢贼”。^[1]身为国家正式武装力量的绿营兵丁与地方盗贼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档案和案件的分析来回应以上问题。关于清代绿营的研究,罗尔纲先生已有传世之作《绿营兵志》。^[2]近年来,学界又在相关领域奋力开拓,尤其是区域性研究方面,有许多优

[1] 《清宣宗实录》卷道光十五年九月丙申。

[2] 罗尔纲:《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秀成果问世,但仍多集中在考辨制度方面。部分成果注意到了绿营与地方治安的关系问题,^[1]但侧重于绿营兵丁的缉捕行为,少见对绿营兵丁通盗为盗行为的探讨,且缺乏具体的研究和分析。绿营长期驻扎地方,却又不归属州县行政机关管理。在牵涉到绿营兵丁的盗案中,绿营兵丁归属的军事系统与州县行政机关之间的复杂关系更值得注意。清自平三藩之后,内地承平百余年,“非用兵次胜之难,而养兵不用难”,^[2]清政府如何防止绿营兵丁自甘堕落进而通盗为盗的措施及其效果也值得进一步讨论。鉴于此,利用相关史料和具体案件,进一步审视清代绿营与地方社会法律秩序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清代的地方治安与绿营兵丁

我国古代重视安静有序的社会秩序,因此对地方“盗贼”行为的打击极重。“盗”者,“取非其物谓之盗”;“贼”者,“无变斩击谓之贼”。^[3]此类犯罪不仅严重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更易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正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3]于是历朝历代均对地方“盗贼”予以厉查严惩。至明代,地方缉捕盗贼的责任由地方行政系统、卫所、镇戍营兵等共同承担。明初普设卫所,地方卫所军有“屯田、验军、营操、巡捕、漕运、备御、出哨、入卫、戍守、军器”^[4]等任务。后营兵制建兴,此责亦由营兵承担。明代的镇戍营兵,虽然承担一定的地方缉捕事务,但此制因军务而兴,以军事镇压职能为主,如沿江、海巡防,备倭及会剿大规模的流贼等,对于地方普通盗案参与

不多,至清代绿营“化整为散”,才使得国家的经制军事力量深入参与到地方盗案之中。

清入关之初,原以八旗为主要军事力量。但八旗人数少,驻京禁旅又占去总数大半,剩余的则以“居重驭轻”的原则,驻防于各省重要的城市,如江宁、杭州、西安等。于是为加强对广大国土的控制,清政府即在前明镇戍制度的基础上,将收编的大量前明军队改造为绿营。罗尔纲先生曾对此进行过总结,将清代对明代镇戍营兵制度的发展改造归纳为五个方面,即“从经制的变为非经制的、从建立于一部分的变为普遍的、从参差不齐的变为划一、化整为散、改无定籍的兵为土著的兵”。^[5]其中,“化整为散”与“兵皆土著”两个制度上的变革,使清代对地方治安的参与深度得到大幅提升。

首先,清代对镇戍营兵“化整为散”的制度变革,使清代的军事力量得以深入基层社会,便于与地方行政系统相互补充以维系地方秩序。清代的绿营按标、协、营、汛的组织体系,星罗棋布地分散于全国各地。以“镇”这一级军事单位而言,《明会典》所载全国镇守之数不过二十,且集中于京师周围及沿边塞防之地,如昌平、宣府、大同、固原、宁夏、延绥等,^[6]但清代康熙时,全国的镇数已至54镇之多,^[7]且仍随着清朝版图的扩充、人口的增加而不断增多。其地理位置亦不再限于边防之地,腹里内地各省地方亦普遍设镇。镇数既多,其所分之营汛则更多,如人体之毛细血管,触及各地,地方有事,则可立时上禀,督抚提镇云集大兵,朝夕至,一举荡平。而若地方有盗贼流窜,亦可于大路汛防关卡哨所之处及时查拿。

[1] 代表性成果如柏桦:《清代律例规定的官方治安责任》,载《晋阳学刊》2009年第4期;王爱英:《从绿营防汛到近代警察——清末军事变革的再审视》,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11期;白京兰、田庆锋:《清代新疆八旗绿营司法职能略论》,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王爱英:《清代广东绿营标兵与地方社会治安防范研究》,载《清史论丛》2020年第2期;刘洋:《清代基层权力与社会管理研究》,南开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滕冉:《清代四川驻县绿营兵研究——以〈南部档案〉为中心》,西华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等。

[2] 沈一贯:《咏鸣诗文集》卷二《赠定海汪尔通明府考绩》,明刻本。

[3]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〇《志二十·刑法志》。

[4] [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六《志五十二·职官五》。

[5] 罗尔纲:《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8-35页。

[6] 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广、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各镇总兵一员。见[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六《志五十二·职官》。

[7] 《大清会典》(康熙)卷八六至卷九二《兵部·职方清吏司》,康熙二十九年刊本。

其次,相较于明代镇戍营兵,清代绿营实行“兵皆土著”的制度变革,使清代的绿营兵丁较之明代的镇戍营兵,与地方社会联系更紧密。明初实行卫所制,军人均入军籍,归卫所管辖承差。此时的军人遇事抽调,事毕返卫,与地方关系紧密。营兵制渐兴后,镇戍士兵皆无军籍,随处而募,与地方遂致脱节。清代则整合了明代卫所制与营兵制的特点。兵皆以本地土著人士充选,于是士兵之宗族家眷均在本地。如此好处有三,一是可以防止兵为将有、尾大不掉之患,将全国的士兵集中于朝廷统一掌握。二是可保证兵源,因士兵家小眷口均在本地,若是该兵丁妄图逃避兵役,则便于该管官员追拿惩治。^[1]三是地方弁兵皆为土著,熟悉风土地理。若有盗贼生发,更便于访闻捉拿。

最后,清代还进一步地对绿营制度进行完善,强化了绿营对地方治安的责任,并相应地调整了地方上其他的责任机关。地方平常盗案,原可由州县衙门所辖之捕役、弓兵等负责缉捕,然而清初为节约经费,将地方州县的捕役弓兵等进行裁革,并降低其公食银的数额:

顺治九年夏四月丁未,户部以钱粮不敷,遵旨会议……一在外各衙门书吏人役,每月给公食银五钱,余应尽裁。一各州县民壮五十名,应裁二十名。^[2]

这样一来,一方面原本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民壮番快等数额减少,待遇降低,另一方面顺治年间地方不宁,多有响马盗贼扰乱,州县之力不足弹压,绿营兵丁遂承担起地方治安的任务。“民壮番快等役,原以捕盗。近因节省工食俱行裁减。今腹里州县请照旧添设,但各处盗贼响马合伙行劫,非番快等役可以扑灭,无庸议设。仍应责成营将分汛设防”。^[3]如此一来,绿营兵丁仅食经制俸饷一份钱粮,却可承担军务、内政等多项差役,即罗尔纲先生所言“差操不分”者是也。清代“州县所设额设捕役多者不过十名,少者数名,侦缉势难周到。是以责令营兵协缉,城守有驻防,大路有塘汛,耳目众多,足资巡缉,立法非不尽善”。^[4]

随着绿营分汛设防并开始更多地承担地方治安任务,清政府亦开始完善绿营相关制度,包括沿大路修建墩台,分设汛兵驻守、增添塘汛驻防、允许绿营兵丁携家口妻子驻汛等。于是地方绿营兵丁遂与州县捕役趋同,“境内窃匪不获于捕役,即获于兵丁”。^[5]

可见,清政府自清初因军事需要普设绿营后,

一方面出于弹压镇守的政治需要,一方面出于节约经费的财政需要,结合了明代的卫所制与镇戍营兵制的特点,对绿营制度进行了发展和改造。清政府的设想是“平日以数千人归伍操练,山川道里皆所熟习。无事用以捕贼,有事用以御敌。购线获犯,皆其所长,何必另雇义民,骑驴觅驴乎?且粗率不驯之民,驭以兵法,则内收一土著之民,外少一土著之贼。即以土著之兵管束土著之贼,防微杜渐,奸细易查,以矛陷盾,尤为所长”。^[6]在清政府的制度设计下,绿营兵丁承担各类差操职责,于地方治安则专司防汛缉捕,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

二、地方社会中绿营兵丁的不法行为分析:人际关系网络与经济需求

在清政府的制度设计下,各地绿营深入地方,布置于重要的水路要津、关隘城镇等处,更于道路旁置驻墩台,分兵驻守,布置成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卫之网。清政府立法之原意,在于将国家的军事力量渗入各地,以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奸盗暴乱事件,正所谓“建立营汛、分布官兵,乃国家定制。原以诘奸禁暴,安戢善良”。^[7]但此制设立之后,绿营兵丁反而常常在地肆行不法,与地方贼盗勾结来往,主要的犯罪行为有:

(1) 包庇纵放。即绿营兵丁包庇地方盗犯,并不查拿。即使盗犯被缉获,也会多加回护,甚至会私自将盗犯放走。“平时得规包庇,临时或通信远飏,或受贿纵逸,竟至积年巨盗叠劫横行”。^[8]

[1] 罗尔纲:《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9-242页。

[2] [清]蒋良骥:《东华录·顺之十八》,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3]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顺治十六年十月乙卯。

[4] [清]辅德:《请定将弁协缉事宜疏》, [清]贺长龄等:《清经世文编》卷七五《兵政六》,光绪十二年校本。

[5] [清]辅德:《请缉捕责成大员疏》,《皇清奏议》卷五五,民国景印本。

[6] [清]陈盛韶:《问俗录》卷六《戍兵》,道光刻本。

[7] 《清高宗实录》卷二二,乾隆元年七月辛丑。

[8] [清]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 [清]贺长龄等:《清经世文编》卷二三《吏政九》,光绪十二年校本。

(2) 交接往来。即绿营兵丁与地方盗犯互相认识, 交往亲密, 进而通气交游、泄漏消息。如广东, “粤省绿营不肖兵丁, 本有私通盗匪之事”。^[1]又如福建, 道光二十年, 广西监察御史贾臻奏福建兵丁与当地盗匪勾结来往情形, 言:

臣细加访求, 始知该省海盗不必尽系无籍匪徒, 多有本地土著民人……水师兵丁或係其亲戚, 及素所交游。每遇操演, 知若辈谙习水性, 壮勇可观, 雇觅代操, 希图塞责, 是此等奸徒下海则为盗, 归里则为民, 受雇则为兵。^[2]

福建兵丁甚至有雇募熟悉水性的海盗充营以应付操演的。至于其他各省, 则所在皆有, “其各营兵丁交通盗匪, 无所不为”。^[3]

(3) 贪利助盗。即绿营兵丁贪图盗犯得贿赂规利, 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帮助盗犯行盗。这种行为十分常见。

(4) 亲身为盗。有时当地驻防营兵会直接参与到盗劫案中, 或纠结其他兵丁, 或与地方盗犯聚众结伙, 亲身为盗。清代“有汛地守兵矚过客之厚贄, 窥居民之饶蓄, 勾盗伙劫, 器械即便取携, 门禁谁复拦阻, 玩法殃民, 深属可恨”。^[4]

清代“兵皆土著”的制度最开始的目的虽然是“以土著之兵管束土著之贼”, 但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使绿营兵丁与地方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 因而与当地盗贼也得以“往来熟识”, 甚至互为亲戚, 下举数例:

(1) 乾隆十八年二月山西人楚进宝、常国安等人盗马一案。乾隆十八年二月内, 山西人楚进宝、常国安于口外盗马大海溜等处盗马八匹, 楚进宝等知赶马进关需经过万全县水沟台汛地, 担忧被查, 于是找认识的万全县民张英央其帮忙, 言“你与水

沟台汛兵认识, 烦你向他说通, 给吊数钱, 放我们进口罢”。张英遂找到素识的水沟台汛兵刘成, 给其给其花钱三吊, 刘成遂即应允。^[5]

(2) 乾隆四十二年广东梁亚香与凌大头蓉等十五人彼此纠伙行劫一案。其行劫出入水口原在沙湾之大沙洲一带。但后来该地庄民见其形迹可疑, 不容停留。于是这批盗犯转移至石碁小龙涌口地方。该处为水陆要冲, 有塘汛兵丁驻守。但伙盗之内的胡建南、胡祖南二人, 系汛兵郭闰的妻弟。于是二人以出口贩盐为借口, 贿赂郭闰及其该管外委李圣彪放行。又有沙塘司巡河散役梁俊均, 系盗首梁亚香同族。梁亚香每次出口行劫之后, 其船只由石碁水口出入, 都送给梁俊均花钱三五圆不等。^[6]又如嘉庆十八年漳浦盗犯薛川、蔡和等行劫城内柯作霖绸布店一案。嘉庆十六年三月, 薛川、蔡和与魏粹、何寸等人先后至素识的许类家闲谈, 各道穷苦。许类探知城内有柯作霖绸布店殷实, 起意商同行劫得赃分用, 其他各盗允从。但进城行劫, 须扒城而进, 恐被巡查营兵撞见。而伙盗中的魏粹, 有族叔魏旺生充当营兵, 派在西北角巡城。于是魏粹即邀魏旺生至许类家, 许成功之后分给赃物, 魏旺生遂应允。^[7]

(3) 嘉庆十九年, 盗犯蔡兆祥、江潮扬等出洋行劫一案。每次行劫之后都将赃物交给当地居民陈凤兰销赃。嘉庆二十年正月底, 汛兵戴德元访闻得知其事, 于是前往查拿。陈凤兰给戴德元钱六串, 恳求其包庇, 并许以随时帮助。戴德元于是应允。至嘉庆二十二年四月, 又有营兵孙骥挑补守江场汛外文, 闻听汛兵戴德元有得规通盗之事, 于是欲行查问革究, 戴德元畏惧, 跪求孙骥恳请容隐, 声称情愿得钱分用。孙骥担忧失察营兵通盗有干参处,

[1] [清] 那彦成:《剿抚洋盗》,《那文成公奏议》卷一二《两广总督奏议》,道光十四年刻本。

[2] 《奏为风闻闽省兵丁多与海盗勾串请饬令查办事》,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录副奏折》,档案号:03-2985-024。

[3] 《清宣宗实录》卷二二道光十二年闰九月戊戌。

[4] [清] 于成龙:《亲民官自省六戒》, [清] 戴肇辰辑:《学仕录》卷二,清同治六年刻本。

[5] 《题为审理张家口蒙古贼犯朋苏克等偷盗马匹贿通汛兵私放进口等情案依律分别定拟请旨事》,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刑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7-05213-005。以下所引用档案如无特殊标注,均藏于该馆。

[6] [清] 全士潮:《驳案新编》卷七《广东司》,光绪七年刻本。

[7] 《奏为遵旨审明漳州镇标左营游击希智等失察兵丁通盗分赃并县府未讯实情分别按律定拟事》,嘉庆十八年正月二十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548-024。

又贪图得钱分肥，于是亦即应允。^[1]

(4) 道光十五年福建南平县盗犯欧大养、欧大珠、林梨梨、欧岁岁等伙盗一案。该伙盗多次行劫，后福州城守营右军阳岐汛兵陈百受访知此时，告知同汛兵丁李存英留心缉拏。该汛兵后将欧大珠拿获。欧大珠央求两人共识之陈洸海说合，原送给番银五十圆，陈百受首肯，回营与李存英商允，随后将欧大珠交与陈洸海保回。^[2]

(5) 道光二十七年广西武宣汛兵玉士华等人纠伙为盗一案。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广西武宣汛兵王士华、陈忠与素识的佣工李法余、陈亚年等人聚会谈天。聚会时，各人均谈起身家贫苦，难以度日。汛兵王士华因其所领饷银只能养赡身家，于是起意行劫过往客船，邀陈忠等人入伙，其他人均答应相从。汛兵王士华又邀民人彭八、冯学健等人，汛兵陈忠又邀得营兵朱德胜、潘林胜等人，其余各盗均各自转邀同伙。共约得二十人，于十二月十八日于武宣县灯盏潭河面行劫。^[3]

从以上数例均表明，在地方社会中，存在着一张连接营兵与盗犯的社会关系网络。凡地方绿营兵丁牵涉盗犯，均与社会网络中的相关盗犯有关。或兵犯素相认识，或共同认识某一中间人，或直接互为亲属。如可见“兵皆土著”这一制度对绿营兵丁通盗为盗行为的影响。“塘汛兵携带家口，安土重迁，与地方奸匪往来熟识，以致放胆游行，竟成盗贼之渊藪”。^[4]原本“以土著之兵管束土著之贼”的“兵皆土著”制度，反而因为士兵与地方社会联系过于紧密，导致“猫鼠同眠”的弊端。

除社会关系因素之外，以上案例也表明，绿营兵丁穷乏的经济状况也是造成其通盗为盗问题的主

要因素。绿营兵丁本身饷银无多，其饷银又为经制的财政所固定。清制，马兵一月饷银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外加给米三斗。^[5]此制相沿不改，但清代的社会经济却不断发展，尤其是十八世纪以降，物价日渐高扬，兵员生活日见困苦，于是绿营兵丁遂纷纷另寻生计。雍正帝曾上谕“盖绿旗兵丁系土著之人，经营度日稍觉容易”，^[6]可见地方土著绿营兵丁除食俸饷之外，还需经营其他产业以度日。绿营兵丁经济状况的贫乏直接导致其铤而走险，勾结盗贼。前文所举各案中，已多见绿营兵丁因穷困贪赃而犯罪的案例。虽然绿营兵丁缉获盗犯有一定的奖励，但该管官员多不予兑现。“兵役额支工食无多，外出躡缉全藉官发盘缠，获犯到案，又图按名奖赏。今官惜小费，获犯并不为功，不获犯亦并不为过。赏罚不明，勤惰不分，则不如包庇贼匪，转可从中分肥。即使破案到官，亦必多方回护，又何乐而不为”。^[7]

可见，绿营兵丁身为国家经制武装力量却参与到地方盗案之内，与其地方交游网络紧密及日渐贫苦的生计相关。

三、特殊身份与武职系统的影响： 以乾隆十一年浙江营兵为盗案为例

造成绿营兵丁肆无忌惮的另一原因在于绿营兵丁的特殊身份及其管理归属。绿营兵丁不同于地方州县的差役弓兵，他们为清代国家经制的武装力量，归于绿营武职系统管辖，“兵丁不同捕役，又无提比之例，既为赏罚所不及，即每置身于局外”。^[8]地方的州府县行政系统对之难以约束，因此地方官员在侦办此类案件时多有掣肘，顾忌颇多。文武两途视为秦越，

[1] 《奏为申明弁兵地保孙驥等得赃纵盗案按例定拟事》，嘉庆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585-042。

[2] 《奏为拿获在内江内洋叠劫盗犯并究出汛兵得贿故纵申明定拟事》，道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767-028。

[3] 《奏为遵旨申明广西武宣汛兵王士华身为盗伙行劫案按律定拟事》，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005-035。

[4]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乾隆元年五月丁巳。

[5] 《大清会典则例》卷五二《户部·俸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清世宗实录》卷四四，雍正四年五月壬辰。

[7] [清]那彦成：《搜弭盗源》，《那文成公奏议》卷六九《二任直隶总督奏议》，道光十四年刻本。

[8] [清]辅德：《请丁将弁协缉事宜疏》，[清]贺长龄等：《清经世文编》卷七五《兵政六》，光绪十二年校本。

互相猜忌，致使兵丁难以管束。乾隆十一年浙江营兵为盗案，可作为典型案例加以分析。

乾隆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晚，江南江宁府客商张云从在浙江宁波府属慈溪县城山地方船内被劫去银四千三百两，赃巨情重，慈溪县知县倪知本即行申报上司，设法访查。^[1]至乾隆十年六月时，镇海县县丞柴理访问得知驻扎在该县的提标右营兵丁沈光耀行踪诡秘，于是密禀宁波府知府魏崢，该府即商同知县倪知本设法访察。倪知本又亲自将沈光耀之兄沈二拿获，审出沈光耀近来忽然拿出六七十两银子娶妻，并置买房屋等可疑情事。于是禀明本管宁绍台道叶士宽，于二十五日与知府魏崢一起亲往右营游击严雄处讨拿沈光耀过审，沈光耀审讯直认不讳，同时供出伙盗民匪三人，兵匪八人，俱被民人董枝茂等起意纠党，同伙往劫。倪知本即回禀知府，自己亲自带领衙门捕役追拿民匪。由知府魏崢至提标中营通知该营参将连英，令其知会各营，将兵匪八人拿获，解县收审。^[2]

此案至此，本可告一段落，但在后续的审转过程中，此案却转而因文武问题而导致办理失措。先是右营游击严雄在倪知本等于营中捉回沈光耀后，担忧其麾下营兵为盗，自己及上司要获重咎，于是在二十五日沈光耀被倪知本拿获解县之后，即于二十六日密报营内上司，言自己发现麾下营兵沈光耀娶妻置买房屋，行踪诡秘，已经主动查拿，发交地方官收审。于是州县文官处以倪知本先行拿获为盗兵丁上报，而绿营武官处则以严雄先行拿获为盗兵丁上报。^[3]后沈光耀为盗行劫被捉之事被当地百姓所知，于是民间流言四起，百姓“见一弁则群目之为强盗头儿，过一兵则咸指之为盗伙”，而当地“系提督驻扎海疆重地，又客商辐辏买卖，屯聚通洋之所”，驻兵甚多。各营弁兵闻知民间传闻，忿然不平，纷纷异论，以致当地兵民对峙，有民人甚至呼喊“大家动手”之语。^[4]而浙江巡抚常安畏惧地方兵民滋事，且担忧此案由地方文职追获审办提标之兵丁，得罪于浙江提督陈伦炯，于是起意为武职营员回护。遂一面戒飭地方文武各员，后在批谕宁绍台道叶士宽的手本上写“文武和衷办理”字样。叶士宽遂招知县倪知本、宁波府知府魏崢商议，说“抚宪有批禀，要文武和衷不可贪功，视为秦越”，于是倪知本遂改前禀，以营员自行访获具详。^[5]浙抚常安、浙提陈伦炯遂均以此案为营员自行访获，

详禀于闽浙总督马尔泰。马尔泰以知县倪知本先称为盗兵丁是自己拿获，又改称营员拿获，前后言语互相矛盾，令按察使万国宣确查。倪知本无奈，只得主动揽责，称“实系营员先行发觉……前禀未将情节详细叙明，实属疏漏”。于是马尔泰遂参知县倪知本等藐玩功令，请旨严处。倪知本后被照溺职例革职，宁绍台道叶士宽及知府魏崢各降一级调用。^[1]巡抚常安则以营员先行拿获案犯具题。

此案至此几乎已成冤案，但之后的事态发展却出乎意料。浙江提督陈伦炯后得知沈光耀确是倪知本于乾隆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就已解县审讯，担心部驳获咎，居然令各营将备按饷交纳银两，交由千总严殿选、外委把总李世隆携带，由浙到部打点行贿。严、李二人到京，托刑部河南司贴写张法周打点，后被浙江司经承李如云告发。^[5]刑部审办这些案犯，发觉前浙江营兵为盗案情节蹊跷，于是将相关案情上奏乾隆帝。乾隆帝遂发现浙江文武官员内部通同包庇，混蔽事实的问题。遂于当年五月二十五日发布上谕：

营兵为盗，该管之武弁现在钻营行贿，冀免重处。而该抚等审拟竟以营员访拏具题。事关武弁营私，通同行贿。马尔泰甫自浙回闽，不必令其复来。此案着交与江苏学政崔纪、布政使安宁前往浙江，秉公确审，定拟具奏。所有刑部奏折、邹铃等私书四件，一并封发。^[6]

[1] 《题为特参浙江省慈溪县知县倪知本藐玩功令请旨勒部严处事》，乾隆十年九月十八日，《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4403-002。

[2] 《奏为敬陈遵旨查审浙江营兵为盗该管武弁在部探问行贿一案情形事》，乾隆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137-031。

[3] 《奏为遵旨查明倪知本被参缘由据实复奏事》，乾隆十一年九月初一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137-034。

[4] 《奏为备陈宁波营兵为盗案情始末并督臣马尔泰办理情形事》，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137-029。

[5] 《题为遵旨核拟浙江宁波营兵丁伙劫为盗该管武弁林杰等在部行贿一案依律分别定拟等情事》，乾隆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刑科题本》，档案号：02-01-007-016740-0003。

[6] 《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七，乾隆十一年五月庚申。

乾隆帝的上谕中,明令此案不再归浙江本省官员审办,亦不再归行政系统和绿营军事系统的官员审办,反而交与江苏学政崔纪主审。表明了乾隆帝对浙江文武各官的不信任。由于闽浙总督马尔泰不驻浙江,于是乾隆帝断定此案是浙抚常安在朦混。四天之后,乾隆帝专发廷寄于常安责问:“浙江兵丁为盗一案。系乾隆九年十一月内行劫,至十年六月拏获,及拏获之后至今又将一载。该抚始行审拟具题,甚属日久。其因何不行按限具题以至迟延若此,可传谕询问常安。令其具折奏闻。”^[1]乾隆帝责怪常安办案迁延,已带有怀疑逼问之意。

面对乾隆帝的两次上谕,常安先是回奏所办案件并未迁延,但乾隆并不相信,在其折上批曰:“知道了,此案汝不能免瞻顾之习,非朕任使之意也。”^[2]当年七月,崔纪审明案情,指出确实是知县倪知本率先拿获案犯,提督陈伦炯等武职营员担忧部遣,于是据营员严雄捏饰自行访拏之词具题,又恐部中驳诘,于是派员至京师行贿。对于浙抚常安,崔纪则隐晦地说其“以营员访拏具题,似有代提臣及营弁等开脱之意”。乾隆帝批复曰:“好,所办甚公平而妥,照例具题可也。”^[3]常安得知审拟结果,急忙上奏为自己辨明,并参劾总督马尔泰平日不能管束麾下武职,遇事只知推诿己责。乾隆帝大怒,批曰:“此奏甚愚而险,汝所指马尔泰之处,朕不能为之讳,实皆有之。然汝之过处,汝何不明言耶?将以巧辞欺朕,朕岂被尔等所欺之主哉!不思以国家政务为重,和衷办理,而为先入之言,甚属无耻。”^[4]后乾隆帝以巡抚常安“于地方尚属安静,故姑留之”,提督陈伦炯被降三级调用。总督马尔泰则在当年九月被乾隆帝以“精力不逮,难以办理总督事务”^[5]为由,勒令卸下总督职务返京。

在此案之中,营兵为盗的犯罪事实比较简单清晰,反而是此案的经办过程值得讨论。此案之所以迁延日久,首先是因为营兵为盗,难以觉察。若非沈光耀突然拿出巨款买房娶妻,地方官吏很难察觉。其次,在捉拿案犯的过程中,绿营官员得以因归属系统不同,率先向该管上司呈报,造成州县和绿营两个系统之间的矛盾。最后,在案卷转解往来的过程中,又因州县和绿营的内部的各种原因,造成一干无辜人员被参被劾。足可见

绿营兵丁的特殊身份和背后的武官系统对地方行政官员侦办相关案件之掣肘。绿营兵丁为国家经制武装力量,由武官系统管辖,文武异途,导致地方州县官员在处理兵丁案件时颇有顾忌。康熙时,陶元淳曾对此议论曰:

今之文武既分,势力既不相下,权任又不相辖。陆则将领有兵而令长无兵,水则将领有船而令长无船。或将领贤而令长玩寇,以为防守固武臣事也。或令长贤而将领容奸,以为文吏无奈我何也。彼此相抗,亦彼此相谗。虽有严法以督其后,心力终不能齐。如此责成岂得谓之合宜?^[6]

可见,清代盗案中涉及的文武关系、兵民关系、督抚关系等,均对审判的独立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巡抚常安为自己辩白时所说“兵非臣管之兵,官非臣管之官”,所言非虚。本来归于州县管辖的捕役通盗,地方官员就已难以追捕。而驻于营内,归于武选的绿营兵丁就更难以管束。且由于地方盗案涉及处分,更加剧了文武矛盾。“文员最忌营汛获贼,通报上司,即形其短,虑生嫌隙……而其本管营汛间有不法兵丁或阴通匪类,或得规纵放,或坐地分赃者,转不知畏处分而加稽查”。^[7]至嘉道以降,随着绿营军纪日益败坏,兵丁为害地方、绿营官员徇隐包庇的现象不仅更加严重,且难以察觉惩办。

“乃办理盗案,每年不下千数百起,而罪及窝主者

[1]《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七,乾隆十一年五月甲子。

[2]《奏为据实复奏宁波城守营兵丁沈光耀等并民人董枝茂等盗案审办具题尚未逾限事》,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吏科题本》,档案号:04-01-01-0137-012。

[3]《奏为敬陈遵旨查审浙江营兵为盗该管武弁在部探问行贿一案情形事》,乾隆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137-031。

[4]《奏为备陈宁波营兵为盗案情始末并督臣马尔泰办理情形事》,乾隆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137-029。

[5]《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五,乾隆十一年九月丁巳。

[6]〔清〕陶元淳:《搜捕盗贼责成文武议》,〔清〕贺长龄等:《清经世文编》卷七五《兵政六》,光绪十二年校本。

[7]〔清〕辅德:《请丁将弁协缉事宜疏》,〔清〕贺长龄等:《清经世文编》卷七五《兵政六》,光绪十二年校本。

十无一二，况能严惩兵役耶？”至于有司“治兵役以故纵之罪，更属罕见之事”。^[1]绿营“将弁群习为因循，兵丁日趋于流荡……每借营为护符，包庇匪类”，^[2]已经需要清政府作出控制。

四、清政府对绿营兵丁通盗为盗行为的管控及影响

对于地方绿营兵丁的违法行为，自清初时便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为解决这一地方顽疾，清政府不断增修律例，扩大刑罚的使用范围和处罚力度。

首先，严格该管将弁的相关责任。顺治初年，定绿营兵丁生事扰民，该管官失察者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九月。康熙十一年，江西南瑞总兵官赵光祖标下效用官为盗，被降三级调用。^[3]旋定绿营兵丁为盗，该管官革职，兼辖官降三级调用，统辖官罚俸一年，隐匿不报及捏饰者革职。但若能及时察报则免议。同时规定，若该管官因事公出时其麾下营兵为盗，则以绿营兵丁为盗事发日月为算，其为盗日月在该管官公出之前，事发于公出之后者，仍照例议处。若为盗日月在该管官公出之后，事发于未回之前则免议。若绿营官员领兵贴防而贴防兵丁为盗，该管官员要照地方官失事例议处，领兵贴防官革职，贴防的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康熙十三年，定绿营兵丁窝盗、聚盗及受赃漏信令盗脱逃者，该管官降二级调用，兼辖官若同城，则降一级调用，不同城，降一级留任，统辖官降一级留任，若该管官弁徇纵，则照违盗例分别议处。^[4]

至嘉道年间，绿营军纪日趋败坏，于是清政府加重了相关官员的惩罚力度。道光三年，定绿营兵丁为盗，专管官革职，同城同营之兼辖官降三级调用，统辖官降二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一年。不同城百里之内兼辖官降二级调用，统辖官降一级留任。百里以外的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督总兵罚俸一年。若该管官能自行查出则免议，若隐瞒讳饰或倒提年月、开除名粮，或捏作平民等，均革职提问。若绿营官员领兵贴防而贴防兵丁为盗，该管官革职，贴防驻扎的兼辖官同城者降三级调用，统辖官降二级留任，提督总兵罚俸一年。不同城百里以内兼辖官降二级调用，统辖官降一级留任。百里以外兼辖官降二级留任，统辖官罚俸一年。提督

总兵罚俸六个月。若各营汛弁及随营效力人员有勾通贼匪行劫及聚盗受赃者，即与盗无异。一经发觉，将该管、兼辖、统辖及提督总兵各官，均照贴防兵丁为盗例分别议处。若是提督总兵的标下兵丁，则将提督、总兵照该管官例议处。若绿营兵丁窝隐盗贼及聚盗受赃、漏信脱逃者，失察之专管官革职，兼辖官同城者降二级调用，不同城者降一级调用。统辖官降一级留任。若该管各官曲为纵放，不行查究者治罪，兼辖、统辖各官均照违盗例分别议处。营兵窝窃受赃者，该管官降一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留任。统辖官罚封六个月。若能自行查拿旧版，则均免议。^[5]可见，清政府所设立之赏罚规则愈严愈密。即使如提督、总兵之大员，若其直辖之标下兵丁为盗，亦不能免革职之处分。

其次，增修律例，扩大刑罚适用范围和对绿营兵丁的处罚力度。清代虽以绿营兵丁承担缉捕盗贼之责任，但在最初的律典中虽并未对其通盗、纵盗、亲身为盗等违法行为进行规范，《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最初仅针对捕役而设。后清政府逐渐增修、完善了相关律例，并不断扩大相关法律的适用范围，逐渐将绿营兵丁纳入适用群体，并开始加重处罚。

先是驻扎地方的塘汛兵丁。《大清律例》中“应捕人追捕罪人”条及“盗贼窝主”等条例，按这些规定的适用原本并不考虑作为国家军事武装的兵丁，绿营兵丁若犯有分赃通贼、知情故纵等违法情形，如何惩办，例无明文。雍正九年时，刑部议覆给事中唐继祖条奏定例，规范捕役为盗的相关惩治条款。定“捕役为盗，虽非造意为首，均照造意为首律，拟斩立决。其失察之该管官，交部议处。如该管官逼勒改供，或捏称革役，该管上司不能查出，一并交部照例议处。如捕役与巨盗结交往来，

[1]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二六《刑律·贼盗》，光绪刊本。

[2] [清]丁宝桢：《浙陈川省败坏情形设法整顿摺》，《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三，光绪二十五年补刻本。

[3] 《清圣祖实录》卷三八，康熙十一年三月壬戌。

[4] 《大清会典则例》（乾隆）卷一二二《兵部·兵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卷六二三《兵部·营伍》，光绪刻本。

奉差缉拿,走漏消息,及非伊承缉拿之案,漏信脱逃者,不分曾否得财,均照本犯之罪治罪”,^[1]并将之修入《大清律例》内“强盗”条下。但此例仅就捕役而言,不涉及绿营兵丁。至乾隆元年,刑部议覆刑科给事中陈履平条奏定例,以承缉盗案汛兵,有审系分赃通贼者,均与盗贼同科,至死减一等。若知情故纵者,照窝主知情存留例分别治罪。如并不知情,止系查缉不力者,照不应重律科断。^[2]于是绿营中的塘汛兵丁遂归《大清律例》中诸法条所规范。雍正九年之条与乾隆元年之条均针对缉拿盗贼之人而设,因此于《律典》中并列。乾隆二十一年,刑部馆修,以“汛兵虽与捕役稍为有间,但分地防守原有诘盗之责,况受限承缉,则与捕役无甚区别。今既分赃又通贼而至死得以减等,是其罪较捕役大相悬殊,安保无以身试法之兵丁为殃民匿盗之奸藪。似宜酌为加重,以示警惕。请将例内至死减一等一句删去”,^[2]于是修改乾隆元年之条,加重了汛兵通贼分赃的处罚,绿营汛兵有通贼分赃等情形的,一旦被察觉,不再至死减一等。嘉庆六年,刑部查捕役与汛兵俱系缉盗之人,自应事同一例。但律例中仅有此条及乾隆元年及二十一年所修之款可供引用,但本条为盗及与巨盗交结,言捕役而不及汛兵;乾隆元年及二十一年之条为分赃通贼及知情故纵,言汛兵而不及捕役,于适用时多有挂漏,于是奏请将该二条修并为一。同时又查地方防守墩卡汛兵易于为盗,理应添入以昭赅备。^[3]于是又将地方防守墩卡兵丁亦添入其中。

然后是绿营兵丁中的营兵。嘉庆六年修并后的法条,已经规范了捕役与地方塘汛兵丁的通盗为盗行为,但却不及营兵。嘉庆九年七月内,广西布政使恩长条奏,营兵为盗作何定拟,例无明文,请照江洋大盗例,斩决梟示。刑部议覆,以防守墩卡及承缉盗案汛兵已有例文可援引,但情形不一,审判多笼统。于是请嗣后营兵为盗。无论其伙同民人、伙同兵丁,系兵丁为首者,斩决梟示;为从者,仍拟斩决。其有情节重大非寻常行劫可比者,该督抚仍酌量案情分别梟示。并以捕役与兵丁均有缉盗之责,原例捕役为盗与兵丁同列一条,现在添入兵丁为盗分别情形斩梟之文,则捕役为盗亦应与兵丁同科,将为首者亦拟梟示,以昭画一,应请一并增辑。^[4]添入了营兵并加重了刑罚。

可见,清政府的整体政策趋向是不断增修律例,

扩大适用范围并加重刑罚。兵丁通盗分赃,毕竟没有亲身为盗,却不按赃科断,一律至与盗贼同科,已属加重,至死方减一等。至于乾隆二十一年修定例文之后,日渐从严,乃至加于斩梟。在法律的应用上,绿营兵丁与捕役合二为一,在刑罚的力度上,其惩罚力度日渐加重,是明显的趋势。

对于地方绿营兵丁通盗为盗问题,清政府希望在不改变绿营制度前提下,通过修定律例的方式解决,但效果不佳。前文的分析表明,造成绿营兵丁通盗为盗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兵皆土著”的制度下绿营兵丁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盗犯存在交叉;其次,是绿营兵丁微薄的经制收入逐渐无法满足兵丁的生活需要;最后,则是其作为国家军事武装的特殊身份,无法被地方州县行政系统有效监管。律例的修定并不能切中问题的核心。薛允升曾对此议论曰:“捕役兵丁均有缉拏盗贼之责,乃不缉拏,而反故纵,甚至交通往来,坐地分赃,且或送信,纵令潜逃,盗风日炽,未必不由于此,是以严定此条。然法严而不办,此例亦具文耳……虽有此例,万无此案,定例总期必行,此例果能必行否耶?”^[5]从嘉道年间愈演愈烈的兵役通盗现象来看,清政府的律例修定并未达到理想效果。地方缉捕驻防之城防塘汛兵丁不提,即使是督抚提镇之标兵,亦“以拳贼通盗为生”,及地方州县文移请缉,则一面“向文官索取弁兵盘费”,一面“乘机攫取乡民之财物”,造成兵民矛盾,“乡民不胜其愤”,甚至酿成巨案者不时而有。^[6]

虽然清廷清楚绿营兵丁与地方联系过于紧密及俸饷匮乏所带来的问题,但“兵皆土著”之制,意

[1] 郭成伟:《大清律例根原》,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7页。

[2] 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页。

[3] 郭成伟:《大清律例根原》,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0页。

[4] 郭成伟:《大清律例根原》,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5页。

[5]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二六,光绪刊本。

[6] [清]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清]贺长龄等:《清经世文编》卷二三《吏政九》,光绪十二年校本。

在掌握兵权。兵皆土著、将皆升转，兵饷归于国家经制之财政之内，兵将分离，财政握于朝廷，如此则兵权才集于中央。所以即使清廷想改变“兵皆土著”制度下士兵与地方联系过于紧密所带来的问题，也会因国家集权之需要而有所掣肘。乾隆元年，乾隆帝曾专就直省绿营汛兵的通盗行为下发上谕，要求地方督抚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绿营改革措施：

朕闻江南、江西、湖广地方，襟江带湖，广袤数千百里。设立塘汛，所以卫商民、防盗贼也。近访得不肖兵丁疏懒废弛，养盗贻患。受其规礼，分其赃物，为之声援向导。及细求其故，多因兵丁携带家口，安土重迁，与地方奸匪往来熟识，以致事前无忌，事后无踪，放胆游行，竟成盗贼之渊藪。夫汛兵频数更替，出其不意，则与贼无从结识，有纵贼之咎，无伏贼之利，亦何乐乎为此……夫弁兵竭力防缉，则盗贼不致蔓延；船户随在清查，则盗贼无由混杂。然必须封疆大吏刻刻留心、时时察访，规条赏罚，整肃严明，方能着有成效。至汛兵更替之法，尤当因地制宜，俾兵丁得顾其室家，而汛地仍资其防卫。是又在封疆大臣实心区画，善为经理，不徒在文告之虚辞也。着各该督抚悉心详议奏闻。^[1]

乾隆帝此谕，意在不改变“兵皆土著”这一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细节上的调控，但此谕缺乏实际操作性。正如河南巡抚富德在回奏中所言，“今若频数更替，绝其与奸匪熟识以杜弊端，法固甚善，但使其只身前往不带家口，则多内顾之忧，若令其携眷轮流更替，则为时无几，又不免有往返搬移之苦”。^[2]可见原有缜密的制度设计下，通过改变汛兵更替驻防解决其通盗为盗问题的办法难以实施。至于南方诸省，江洋密布，将弁“多用本地之人。盖缘水师与陆路、技勇迥别。非习于洋面风涛者。不克胜任。势不能不就生长其地、谙悉情形之员。随宜简补。以便操防”，更难以更改旧制，于是乎当地绿营将弁“因管辖地方本系桑梓，或曾充行伍。所属兵民，非旧日之朋侪，即同閭之姻戚，熟识有素。遂不避嫌疑，往来杂沓，甚至瞻徇情面，曲庇所亲。以致将卒之等威不辨，营伍之纪律不张”，^[3]此即晚清地方要员常言的“绿营习气”之一。也正因为绿营营伍的不断堕落，致使清政府上下逐渐对绿营失望。对绿营兵丁的防范与鄙夷也愈加重。曾

国藩即言“绿营兵丁实难整顿”“在行间阅历多年，益觉绿营习气过深，难于挽回”。

总的来说，清政府虽希望努力解决绿营兵丁的不法问题，但出于集权统治的需要，不能改变“兵皆土著”绿营驻防制度，也不能大幅提高兵丁的经制俸饷，更无意更改绿营军政民政不分的差操制度，仅从律例上来进行管控，治标不治本，其效果可想而知。

五、结语

造成清代绿营兵丁通盗为盗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除兵源素质、军事纪律等因素外，主要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是清政府出于节约经费、集中兵权、控制地方等原因所设置的“兵皆土著”制度。这造成绿营士兵与驻防地区社会联系过于紧密，从而便于盗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拉拢、贿赂绿营兵丁。而绿营兵丁亦可能受自己熟悉的盗犯诱惑上盗。

其次是绿营士兵待遇不足。清代社会人口增长，物价日渐高昂，而绿营兵丁的收入则常年不变。地方汛兵难以挑补马步战兵，其待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造成其生活困苦，从而更容易被地方匪类勾引上盗。

最后是清代绿营军政、内政不分的制度。绿营属武职，自归军事系统管辖，但却参与内政。不仅与地方州县常常抵牾，且容易在审判经办的过程中对州县司法的独立性造成影响。重重因素影响之下，清代地方汛兵的通盗为盗问题愈发严重。且绿营兵丁的特殊身份，使其相较于州县捕役更难约束。“今日之劣兵蠢役聚盗纵盗，所在皆是”，^[4]绿营军政内政不分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清代社会治理的需要。

[1] 《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乾隆元年五月丁巳。

[2] 《奏为遵旨详议稽查汛兵船只藏奸养盗瞻徇不法等弊情事》，乾隆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005-035。

[3] 《清高宗实录》卷五四〇，乾隆二十二年六月甲子。

[4] [清]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文正公奏稿》卷一，光绪二年傅忠书局刻本。